

# 近现代印度的华文教育：档案与访谈所见噶伦堡中华学校兴学情况（1941—1960）\*

赵晋超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及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口述访谈和历史照片资料，考察印度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兴学历史，教员和学生构成以及教学语言等问题，并由此讨论近代印度各地华文学校的互动关系。梳理噶伦堡华校的教学语言和教员构成情况，可以进一步充实关于近代以来印度和其他地区海外华校之间的互动情况，拓展研究边界，从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南亚华人研究范式转向更为广阔的南亚华人历史研究。

**关键词：**华侨学校 噶伦堡 印度 教学语言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城噶伦堡（Kalimpong）市中心四五公里之外的蹦村（Bong Basti）有一处淡黄色的建筑群，其历史可追溯到1940年代初。这所学校即“中华学校”（Chung Hwa School），在华人商人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于1942年元月建立（图1）。其后将近二十年间，该校成为当地华人群体的教育、文化与社交活动中心。然而，提及噶伦堡中华学校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对学校本身着墨不多，使用材料也局限于英印政府档案和新闻报道。印度华校相关研究则主要聚焦加尔各答。例如，波达尔（Prem Poddar）和张莉莎（Lisa Zhang）的文章讨论《人民日报》在20世纪中叶对噶

\*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伦堡所作报道，新著在此基础上作出扩充<sup>①</sup>。沈丹森使用近年来解密的西孟加拉邦情报部门（Intelligence Branch of West Bengal）档案来分析英印政府在1950年代末针对噶伦堡华人居民所作的监视活动。<sup>②</sup>可汗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出发探讨边境叙事。<sup>③</sup>章立明对印度汉语教育展开历史述评，提及噶伦堡中华学校，但主要依据是1962年台湾出版《印度华侨志》内容。<sup>④</sup>



图1 噶伦堡中华小学学生在“铸材堂”前（马爱慈女士提供）

- ① Prem Poddar and Lisa Lindkvist Zhang, “Kalimpong: The China Connection,” in *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in the Himalayan Borderlands: Kalimpong as a ‘Contact Zone’*, ed. Markus Viehbeck (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7), pp.149–174. Lisa Lindkvist Zhang and Prem Poddar, “Espionage, Intrigue, and Politics: Kalimpong Chung Hwa School as International Playhouse,” *China and Asia* 3, (no.1 2021): pp.35–77. Prem Poddar and Lisa Lindkvist Zhang, *Through the India-China Border: Kalimpong in the Himalay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 ② Tansen Sen, “The Chinese Intrigue in Kalimpong: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the ‘Spies’ in a Contact Zone”, in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eds.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410–459.
- ③ 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 ④ 章立明：《印度汉语教育百年史评述及其发展前景展望》，《南亚学》第2辑，2023年，第188—204页。

综上，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藏资料，历史旧照以及噶伦堡华人的口述访谈资料来分析噶伦堡中华学校从创办到关闭的历程、学生与教师构成、教学语言、课程设置等问题。20世纪中叶正是海外华校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噶伦堡中华学校研究也可进一步管窥南亚华校之间的互动情况，从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南亚华人研究范式转向更为广阔的南亚华人历史研究。

## 一、噶伦堡中华学校与当地华侨华人群体

有关噶伦堡华人情况的最早记载是苏格兰传教士格雷厄姆（John A. Graham）的传记，其中提及城中生活着几位中国木匠。<sup>①</sup>19世纪中期开始，不断发展的滇藏印、滇缅印贸易路线进一步促进了华人往来噶伦堡经营贸易<sup>②</sup>。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噶伦堡逐渐成为羊毛贸易中心，附近大吉岭茶叶种植园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噶伦堡的发展。与此同时，丽江、大理、腾冲等地云南商帮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运销茶叶、丝绸等内地商品，贩回麝香、毛皮等西藏山货。19世纪末，从云南出发途经西藏到达大吉岭地区的传统贸易路线初具雏

① James Minto, *Graham of Kalimpong*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974), p.95. Prem Poddar and Lisa Lindkvist Zhang, "Kalimpong: The China Connection," in *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in the Himalayan Borderlands: Kalimpong as a 'Contact Zone'*, ed. Markus Viehbeck (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7), pp.149-174.

② 不少早期华人是前往今天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工作。参考Jayeeta Sharma,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6-37; Tina Harris, "Yak Tails, Santa Claus, and Transnational Trade in the Himalayas", *The Tibet Journal* 39.1 (2014), pp.145-155. 关于滇商赴缅甸的情况，参考何平《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杨煜达《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陈俊《中南半岛云南籍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形。<sup>①</sup>到了1920年前后,云南商号打通滇缅印通道,马帮将货物从云南运至缅甸港口,再经船运到达加尔各答,随后经铁路、驮运进藏,云南茶叶运输进藏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sup>②</sup>,噶伦堡也就成为各地侨商设分号聚集之处,继而吸引了不少来自京、津、冀、鲁及广东客家籍的华人到噶伦堡开展业务。辛亥革命后驻藏清军取道印度经海路返回,又有上百人选择留居噶伦堡与大吉岭等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些国内难民辗转印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侨居缅甸、新加坡、马来亚等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也大批涌入噶伦堡避难,当地华侨数量猛增。<sup>③</sup>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中外运输主要路线陆续被切断,于是,印度成为我国与盟军东南亚战区之重要补给中心,国民政府多个部门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设立办事处。<sup>④</sup>同时,云南经西藏至印度一线的传统马帮路线被重新启用,当地商号纷纷参与其中,向国内运送战时急需物资。马帮将棉布、棉纱等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从噶伦堡经拉萨运到丽江或康定、雅安,再由汽车运到昆明、成都或

- ① 关于大吉岭地区的历史沿革,参考达瓦次仁《大吉岭历史归属问题研究——兼论锡金与中国西藏的关系》,《西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27—35页。滇茶入藏路线在清朝初年以开始发展,17世纪中叶康熙时交通条件改善、滇西北开茶马市,滇藏茶马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至清末川藏茶叶贸易衰落,滇茶大量销往西藏。参见刘志扬《滇茶产销藏海通道的兴起及其背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16—123页。
- ② 1888年连接加尔各答与大吉岭的铁路开通,通过海路连接起缅甸与印度。周智生曾梳理过滇茶藏销新路线用时,从西双版纳由马帮运至缅甸景栋、仰光,再船运加尔各答,陆路交通到噶伦堡,转马帮进拉萨,全程40余天。而之前的马帮路线单次半年,限于天气原因一年只能周转一次。参见周智生《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学术探索》2002年第1期,第82—86页。李旭:《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45页。
- ③ 参见Zhang Xing, *Preserving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ducation: The Schoo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lcutta, Ind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张幸:《文化认同的传承与创新: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9—58页;章立明:《加尔各答华人华侨的多元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124—137页;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爱国侨领马铸材纪念文集》,《迪庆文史资料》第10辑,2014年,第42—44页。
- ④ Cao Yin, *Chinese Sojourners in Wartime Raj, 1942-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印度华侨志》记载仅政府和内地进入印度服务的华侨总数已达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参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度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2年,第34—35页。

重庆。战时经济给噶伦堡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吸引了大批华商云集噶伦堡。

噶伦堡中华学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42年1月正式成立。<sup>①</sup>学校最初称作“中华小学”，主要面向当地华人提供小学教育。噶伦堡中华学校的负责人梁子质、马铸材和张相诚皆为滇藏缅印商路上重要商号的直接负责人，同时也是关系良好的商业合作伙伴。二战结束后，多数难民离开，亦有留居之人，华人群体总体人数有所增加。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噶伦堡中华学校占地近三英亩，教职工10多名。<sup>②</sup>1952年时，学校学生多达两三百人。除了噶伦堡当地学生，周边不少地区华人儿童也来到中华学校住校寄读。<sup>③</sup>国内的电影、报纸、杂志、连环画在中华学校图书馆里都可看到。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我国在噶伦堡设立商务代理处，来年开始运行。同时指导当地华侨商人组建“茶叶运输公司”，出任经理的便是中华学校校董、京商梁子质。该公司副总经理为西藏邦达仓商号的巴桑登巴。邦达仓老板邦达养璧，他曾积极参与商务代理处的筹建并捐赠办公用地，1954年后被校董推举成为中华学校名誉董事长。1955年初，学校设立中学部，原计划1958年增设高中，但并未实现。主要原因在于青藏、康藏公路相继通车，原本的商贸往来减少，噶伦堡经济开始萧条。中华学校学生数量逐渐减少，一些学生小学毕业后便转入教会学校、加尔各答兴华中学或回国升学。

噶伦堡中华学校在1961年被迫关停，师生予以遣散。从1959年开始，中印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气氛，但是并未直接波及华侨华人群体。一般而言，直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前，各地华校还是保持

① 关于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兴办缘起与经过，笔者另有撰文论述，此不赘述。

② 参见马寿康《甲米次仁——旅印爱国侨领马铸材的传奇人生》，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2024年，第130—134页；马家夔《回忆父亲马铸材》，《爱国侨领马铸材文集》，第172页。

③ 参见徐燕琳《印度代奥利集中营受难者谢其瑞、万永喜口述史》，《客家文博》2022年第2期；《印度华侨志》，第70—71页。

着正常运作。<sup>①</sup>然而，噶伦堡中华学校却早在1960年就受到直接冲击，侨领马铸材遭诬陷入狱，校长常秀峰夫妇也无端被捕，董事会多名成员和继任校长李希禹（又名王位卿）以及教员多人被驱逐出境，校产随后也被印度政府强行转交亲台华人。<sup>②</sup>

## 二、噶伦堡中华学校的教员与学生构成

由于缺少学校记录或纪念性出版物，噶伦堡中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相关记载寥寥。口述访谈和档案记载成为爬梳噶伦堡中华学校人员构成和校园生活的重要资料。噶伦堡中华学校成立时，曾聘任由国内避难印度的知识分子做教师，一方面提供国语教学、解决师资，另一方面提供就业。此外，国民政府曾委派沈福民和李绍潇两名教师<sup>③</sup>。沈福民在1942年初到达噶伦堡后随即出任中华学校校长，但此前信息不清，相关记载来自西孟加拉邦情报档案，沈丹森、张莉莎曾分别撰文详细介绍档案资料<sup>④</sup>，此处不赘述，兹补充新发现重庆市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沈福民相关资料。抗战期间，重庆“侨民华侨师资班”主要为各地华校输送教学人才。沈福民的名字分别出现在重庆市档案

① 关于1962年中印冲突的近期研究，参考孟庆龙《印度官方对1962年战争的总结与反思》，《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第72—90页。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关于1960年代中印商贸关系情况，参考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张秀明《被边缘化的群体：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据新华社1963年1月17日电讯：《印度当局公然把噶伦堡中华学校校产交给蒋帮分子》。Prem and Zhang, “Kalimpong: The China Connection” in *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in the Himalaya, Borderlands: Kalimpong as a ‘Contact Zone’* Zhang and Prem, “Espionage, Intrigue, and Politics: Kalimpong Chung Hwa School as International Playhouse”, pp. 145–147. 依据马铸材、常秀峰后人2019年重访噶伦堡见闻所述，中华学校校舍如今已变为私人住宅。

③ Sen, “The Chinese Intrigue in Kalimpong”, p.430. Prem Poddar 和 Lisa Zhang 在文章中提及一位匿名被访人记得最初两名国民政府所派教员的名字分别是沈福民和李绍潇。

④ Tansen Sen, “The Chinese Intrigue in Kalimpong”. Lisa Lindkvist Zhang and Prem Poddar, “Espionage, Intrigue, and Politics: Kalimpong Chung Hwa School as International Playhouse”.

馆藏师资班学员1940年2月及4月工资表和津贴表名单上，可知沈于1940—1941年间在重庆“侨民华侨师资班”接受培训<sup>①</sup>。上海市档案馆藏《孟买华侨学校纪念特刊》显示，沈福民生于1910年，籍贯绥远，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读。1944年初沈福民开始在孟买华侨学校任教导主任，直至1947年再次回到噶伦堡担任校长<sup>②</sup>。这一记载与张莉莎和波达尔依据西孟加拉邦档案所作研究有所出入，后者记载沈福民毕业于北京大学。结合沈福民曾教授艺术课程等背景，应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为准。

沈福民调任孟买时期，噶伦堡中华学校迎来第二任校长——从孟买华侨学校调任噶伦堡的杨静。杨静原名杨菊淑，祖籍湖南，也曾任在华侨师资训练班接受教育，1939年赴新加坡和马来亚当地华侨学校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静前往印度避难，1940年末到达孟买，在孟买华侨学校出任校长一职，任职一年半。<sup>③</sup>1942年6月28日孟买华侨学校从苏克拉吉街（Suklaji Street）迁址格兰德街（Grand Street），开幕典礼即由杨静主持。1943年1月，杨静奉令调派噶伦堡中华学校，担任校长。杨静的丈夫、文学家周达夫当时也来到噶伦堡担任记者，此前曾在文学泰斗泰戈尔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Bharati）学习。

1947年，沈福民返回噶伦堡继续担任校长，直至1955年引咎辞职。随后董事会任命高年级语文课程教师徐亚声老师作代理校长。<sup>④</sup>徐亚声来自江苏，丈夫薛留生原在新德里中国大使馆担任二秘，1950年中印正式建交后，夫妇二人携两个女儿辗转来到噶伦堡。1947年《东方杂志》第44卷同时刊载了徐、薛夫妇纪念甘地的两篇文章，也多为

① 侨务委员会档案：《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1940、1941级职员学员津贴生活补助费及教授授课酬金表、伙食津贴清册等》，重庆市档案馆藏，馆藏档案号00160001001730000001000。

② 《孟买华侨学校十周年特刊》，上海市档案馆藏，馆藏档案号Y008-001-01351。

③ 原文记载：“杨校长奉令调派噶伦堡中华学校”。关于杨静生平，参考其子周舵相关回忆文章。

④ 根据马寿康先生回忆。

其后研究引用。<sup>①</sup>在上海档案馆藏孟买华侨学校纪念特刊中也提及一位教员名为“徐亚森”，籍贯江苏海门，毕业于上海爱国高师，1943年7月开始在孟买华侨学校任女生指导，1945年纪念册刊发时仍在任。<sup>②</sup>凡此种种，可以推断是为同一人。

1957年中华学校失火，代理校长徐亚声引咎辞职，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推荐了著名画家常秀峰来噶伦堡中华学校出任校长。常秀峰先生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在叔父常任侠的建议下先前往加尔各答任教，随后留学印度国际大学，毕业后回到加尔各答，在兴华中学创立后于是校任教，其妻子饶欢英为第三代加尔各答华人。<sup>③</sup>常秀峰在任期间，曾于噶伦堡中华学校组织了丰富的文娱活动，留下许多旧照。然而，常秀峰在1959年也开始受到印度政府莫须有的怀疑，同夫人在1961年被印度政府关押入大吉岭监狱，数月后全家被驱逐出境。

虽然噶伦堡中华学校的校长主要来自任命调派，该校教师群体的构成情况更为多样。结合口述史、老照片和档案资料，得以了解其中几位的简要信息（图2）。一些教员是噶伦堡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侨。例如，英文教师徐曼华出生于当地藏商家庭。国文教师马福寿出生于噶伦堡，父亲为汉人，母亲来自锡金。据回忆，马福寿老师讲一口流利的北方官话，盖因其祖父原为清朝驻藏川军军械官，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取道印度经海路回国大军中的一员，在返回途中决定留在噶伦堡。马福寿老师的夫人杨兰英也任教于噶伦堡中华学校，是加尔各答唐人街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来噶之前在加尔各答华校教书。此外还有祖籍山东潍坊的王瑞祥老师，主教地理及体育；祖籍广东新会的余秀琼

① 徐亚声：《甘地的苦行与非暴力》，《东方杂志》1947年第44卷，第5期，第14—18页。薛留生：《甘地的一生》，《东方杂志》1947年第44卷，第5期，第1—13页。

② 《孟买华侨学校十周年特刊》，上海市档案馆藏，馆藏档案号Y008-001-01351。

③ Sen, “The Chinese Intrigue in Kalimpong”, pp.435-440.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学者常任侠与画家常秀峰”展览开幕式在北京大学举行》，2019年11月25日。<https://news.pku.edu.cn/xwzh/4badbdc26c3f4ef3886b5c34e7468b90.htm>, 2024年11月2日登录。

老师，教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同样祖籍广东的黄新缘老师，主教小学的常识和自然课。<sup>①</sup>其中，杨兰英、王瑞祥和黄新缘三位教师都是1952年1月创办的兴华中学毕业生，正如校长常秀峰一般，在1955年前后经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介绍，来到噶伦堡任教。<sup>②</sup>



图2 噶伦堡中华学校小学部1955届毕业生与校长和老师们合影于“铸材堂”前。

后排教师，左起：徐发珍，王瑞祥，马福寿，杨兰英，  
徐曼华（白玛），余秀琼，黄新缘，徐亚声

中华学校另有一些教师直接来自国内。一部分正如校长杨静、代理校长徐亚声一样，在二战期间避难留居印度，战争结束后即返回。一部分则是经家庭关系前来。例如，杨象汤是加尔各答丽丰商行老板、打通滇缅印贸易的杨守其之侄子，从丽江来到噶伦堡投奔叔叔之

① 依据马寿康先生辨认。

② 关于兴华中学情况，参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印度华侨志》，第68—70页；张秀明《被边缘化的群体：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页。

后，进入中华学校教书。<sup>①</sup>藏文教师顿珠则是经由西藏商号邦达仓负责人、时任中华学校名誉董事长邦达养璧推荐前来。这批教师多是出于个人选择前来，与国内地方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相比之下，1950年代加尔各答华侨学校的一些华文教师是由广东政府根据合作关系选派送出。

噶伦堡中华学校1940年代建校初所吸纳的学生群体主要是当地华侨子弟，其中也包括不少藏族同胞和二战时涌入的华人难民子弟，同时也开放给印度和尼泊尔学生入学。<sup>②</sup>对于广泛吸收汉藏同胞以及当地学生入学的情况，既离不开当地华侨汉藏同胞紧密联系，也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需求。1943年9月1日蒙藏司请国民司总务司会计处送外交部转给专员蒋建白的密令建议“该校除招收藏胞侨民子弟外，应酌量招收不丹尼泊尔哲孟雄各地青年，并予以同等待遇……”<sup>③</sup>。战时避难噶伦堡的华侨多在战后离开，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师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调整，流动性较明显。

到了1950年代，中华学校继续招收当地学生。中华学校1955年毕业生的合照中便有中尼混血学生。当地孟加拉族儿童也曾在中华学校接受小学教育，例如噶伦堡当地律师班纳吉家庭即把三名女儿都送入中华学校接受小学教育（图3）。噶伦堡中华学校进一步发展为当地华人教育重镇，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现存多幅历史照片记录下来常秀峰任校长期间开展的学校活动。例如，中华学校小学生表演《半夜鸡叫》的故事，而高玉宝指导的该故事片在1955年4月才于国内上映。另有学生表演“拔萝卜”的照片，正是在1957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动画《拔萝卜》播出后不久。由此可见噶伦堡中华学校文艺活动与国内之同步性。

① 参见李旭《茶马古道》，第53页。

② 参见《爱国侨领马铸材文集》，第42页。

③ 同上。



图3 班纳吉 (Banerjee) 三姐妹，噶伦堡当地孟加拉律师班纳吉家庭将三个孩子都送至中华学校接受教育。(马爱慈女士提供)

### 三、噶伦堡中华学校的教学语言与多元文化环境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学校教育情况的重要分析对象。相比南亚、东南亚其他华校，噶伦堡中华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授课语言具有不少独特之处。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华校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初创期主要使用客家话和广东话等方言进行教学。噶伦堡华人群体来源的多样性使其有别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没有一种方言能够成为主要教学媒介，但是中华学校从创校之初便格外强调国语之使用。到了1950年代，中华学校校规规定学生在校必须使用国语交流。1954年初摄制的一张旧照片中，学校创办人马铸材站在中华学校“铸材堂”教学楼入口处，背后墙上石碑刻文纪念其捐资助学之举，下方黑板则书写着“运用国语：在校不许用外国语言，尽力发挥自己的语言，帮助新同学学国语，纠正不用国语的同学”（图4）。



图4 马铸材在中华学校教学楼入口处纪念碑前，摄于1954年初。  
(马爱慈女士提供)

噶伦堡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一方面源于当地华人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广东的客家、广府人，云南各地各族人，还有湖北、山东以及原驻藏清军后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族群互动多样。噶伦堡华人群里中数量最多的当数云南籍商人。在以往研究中，云南华商移民也通常与客家、广府和福建以及潮汕分开归类。<sup>①</sup>更重要的是，云南籍商人在滇缅印藏各地的商贸活动也使其多掌握少数民族方言以及藏语会话能力。云南籍商人民族背景多样——包括藏族、白族、纳西族或回族穆斯林，他们之间的常用交流语言有时是属于官话体系的云南方言，也可使用日常商贸往来常用的藏语。负责建立噶伦堡华文学校的委员会成员主要使用普通话交流。例如，马铸材原是云南中甸的商人，可使用本地汉话方言与藏语交流，其家庭至今使用云南汉话；马富贵出生于拉萨，祖上是从鹤庆迁居中甸的回族；

① F. W. Mote, "The Rural 'Haw' (Yunnanese Chinese) of Northern Thailand", in Peter Kunstadter ed.,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陈俊：《中南半岛云南籍华侨华人研究》，第59页。

张相诚来自鹤庆，但祖上自南京迁徙而来；在中华学校董事会中承担主要对外交流工作的梁子质则是北平商人，常年在拉萨与噶伦堡之间经商，也使用藏话。<sup>①</sup>

这一情况与加尔各答华侨子弟学校差异明显。加尔各答大多数华人移民来自广东和福建，主要讲客家话或粤语。这些移民从事木工、制鞋、牙医和洗衣等小规模生意。<sup>②</sup>19世纪抵达的移民最初聚集在加尔各答市中心，尤其是堡巴扎（Bowbazar）地区。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则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塔壩（Tangra）地区定居，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加尔各答的第二处“唐人街”。<sup>③</sup>来自国内其他省市的移民群体规模相对较小。移民的地域性与生意门类关系紧密。牙医一般来自湖北，古董货物商贩和洗衣工人多来自上海和江浙，少量贩售丝绸品的商人则来自山东。<sup>④</sup>随着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不断壮大，逐渐脱离了19世

① 参见李旭《茶马古道》；周智生《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学术探索》2002年第1期。另有依据马铸材孙辈马寿康（1944年生于噶伦堡）和马寿强（1947年生于噶伦堡）访谈整理内容。关于滇缅商人研究，参见〔日〕吉松久美子《云南回族人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涂华忠译，《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马斌斌《云南回族研究综述》，《文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关于拉萨到噶伦堡一线的穆斯林群体，参见David G. Atwill, *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1960*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但云南籍回族群体与西藏世居穆斯林应做区分，参见杨晓纯《国内关于西藏世居穆斯林研究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最早的客家移民应该是受到广东、福建一带土客冲突（1856—1867年）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的直接影响，参见Zhang Xing, *Preserving Identity*, pp.1-4。

③ 加尔各答长大的谢其瑞家庭故事可以简要说明广东梅县人迁居加尔各答的情况。谢其瑞的祖父在19世纪末从梅县来到加尔各答务工，进入制革业。其家人在20世纪初前来投奔并开枝散叶。到他的父亲这一代，不愿继续从事辛苦的皮革业，转而开设餐馆。参见徐燕琳《印度代奥利集中营受难者谢其瑞、万永喜口述史》，《客家文博》2022年第2期。

④ 加尔各答华人最早参与的行业包括木工、制鞋、皮革和牙医行业，20世纪开始进入洗衣、餐馆和美容院行业。详细研究参考Jennifer Liang, “Migration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 An Insider’s History”, *China Report*, 43.4 (2007); A. Bose, “Kolkata’s Early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ir Economic Contributions”, *South Asia Research*, 33.2 (2013); Ellen Oxfeld, *Blood, Sweat and Majo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Ellen Oxfeld, “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Kolkata, India”, *China Report* 43.4 (2007); Zhang Xing and Tansen Sen, “The Chinese in South Asi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ed. Tan Chee Beng (New Delhi: Routledge, 2013); Amrita Mukherjee, <https://map.sahapedia.org/article/Chinese-Community-of-Kolkata-A-Forgotten-Chapter-in-History/11283>。

纪以来以单身男性为主的群体结构，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心如何为华人儿童提供合适的教育。在这一社会背景下，1920年代加尔各答各区开始陆续创建小学和中学。<sup>①</sup>加尔各答华校发展时期长、学校多，张幸等学者曾对加尔各答华校作出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加尔各答学校教学语言则一般使用方言，尤以客家话或粤语为主。<sup>②</sup>就学儿童即便并非客家人或广东人，常居于此也都拥有了方言口语交流能力。国民政府教育专员蒋建白在1936年7月访问加尔各答的培梅学校后，向教育部提交的报告中便提及，客家话是该校唯一使用的教学语言。在蒋建白访问印度华校之后，一些学校开始转为普通话教学，但包括梅光学校在内的诸多学校直到1950年代依旧使用客家话教学。<sup>③</sup>李桂云（Kwai-Yun Li）回忆称，在1950年代的建国学校，从幼儿园到三年级使用粤语授课，四年级至六年级则转为普通话教学。<sup>④</sup>

噶伦堡中华学校对普通话教学的强调，也与其华人群体构成情况息息相关。二战时期避难于此的华人来自五湖四海。更主要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不断升级，进一步激发了噶伦堡华人群体以及中华学校师生的爱国情结。<sup>⑤</sup>上至跨境贸易大商号，下到沿街小贩，当地华人纷纷参与到救亡运动中，身体力行支持中国抗战。普通话的推广也自然成为团结华人、保持中华文化特性的重要方式。此外，由于1939年后通往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依次封锁，许多印度和缅甸的爱国华商也恢复了传统的滇藏印、滇缅印马帮驮运路线来运输重要物资，例如棉纱、布匹、药材和工业原料，为祖国抗战提供物力和财力全方

① 参见谭云山《印度加尔各答之华侨》，《东方杂志》1930年第11期。Zhang Xing, *Preserving Identity*, p. 9.

② 教育部档案：《函复对于塔坝培梅小学校立案同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13306。

③ 谢其瑞于1955年至1958年间就读于加城梅光学校，学校使用客家语教学。学校的主要学生和教员都是客家人。其中湖北籍华人也在学校学会了使用客语。普通话仅在专门课程上学习。参见徐燕琳《印度代奥利集中营受难者谢其瑞、万永喜口述史》，《客家文博》2022年第2期。

④ Zhang Xing, *Preserving Identity*, p.37.

⑤ 当时印度主要城市都出现了左翼宣传单发放情况。参见 Arpita Bose, “The Kuomintang in Ind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alcutta (1900-1962)”, *Studies in History*, 32.2 (2016)。

位支援。<sup>①</sup>

不过，虽然使用国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噶伦堡中华学校的日常教学可谓是践行了多语种、跨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学生自初入小学便开始学习英语课程。相比之下，1936年档案显示加尔各答梅光小学学生直到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时才开始学习英文。1937年时的孟买华侨小学尚未开设英语课程，1944年时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至初中时需学习“印度语”（即印地语）。

除了英语，学校还提供藏语课程，促进多民族友好共处。早在1941年噶伦堡中华学校建校之时，已采用时任名誉董事长马铸材建议，由各民族各阶层代表组成董事会，尤其强调藏族同胞的重要性。藏语在噶伦堡的大部分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活跃在该地区的云南商人能够使用藏话交流，有的自学成才，有的也源于跨民族婚姻的家庭背景。大多数在跨境贸易家庭中成长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从小就开始学习藏语。不少滇商早在清末时便在拉萨开设商号，娶妻生子，后代自会使用藏语。据传最早走通滇缅印贩茶通道的纳西族商人杨守其生母为纳西族，妻子则是缅甸华人后代黄云泰。其兄杨训知生母为拉萨藏族，后又返回丽江娶纳西族妻子。马富贵等商人祖上为回族，迁居滇西北中甸一带后不断与当地藏族通婚。马富贵出生于拉萨藏族母亲家庭。一些与藏族社区有着紧密商业联系的华商家庭还会聘请藏语家庭教师。腾冲鹤庆商人张乃骞1924年出生在噶伦堡，从小在家中私塾学习藏语和普通话。随后，张乃骞在加尔各答的一所英语寄宿学校接受正式教育，二战期间返回国内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张氏家族经营的恒盛公与西藏三大贸易公司之一的热振昌保持着非常紧

<sup>①</sup> 抗战时期滇缅路传统马帮商路恢复较早，约在1940年间，主要是鹤庆、喜洲商帮依靠滇缅公路开展。1941年12月滇缅公路中断后方才开启滇川藏印马帮运输线，主要是丽江商号参与。参见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

密的商业联系。<sup>①</sup>1944年出生的马寿康（马铸材长孙）每天在学校学习课后仍需在家中强化英语和藏语。马寿康每天早上6点半学习藏语，晚上7点半补习英语，均由家庭聘请私人教师。

关于噶伦堡中华学校课程设置，尚未找到相关档案。但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一份1936年档案，提及加城塔坝唐人街的培梅小学“每周上课三十六小时，计国语六、算术四、信札三、历史地理公民自然社会各二、卫生音乐游戏作文珠算各一，余为习字”，可供参考。<sup>②</sup>

1950年代中期，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印地语开始被纳入印度华侨学校课程。但在日常生活中，噶伦堡学生仍使用基本的尼泊尔语口语与当地社区居民交流。这一语言环境也与加尔各答华校形成了对比。在日常生活中，加尔各答华人更倾向于使用印地语而非当地通行的孟加拉语。<sup>③</sup>噶伦堡中华学校一方面格外强调国语作为授课语言，重视国民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每年国庆日均升国旗、奏国歌；另一方面则在日常课程中提供多种语言课程，尊重当地作为边境贸易重镇、多种文化交融地区的特色，保证教学内容的多样性。1950年代在噶伦堡中华学校曾有多名当地尼泊尔和印度学生入学并完成学业，这一点在印度乃至东南亚华校都极为少见。1944年孟买华校纪念特刊中明确指出学生应为“中华民国籍男女”，加城华校更是直接服务于当地华人社区。

##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依据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资料对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兴学历史、教员与学

① 参见李旭《茶马古道》，第45—72页；张相时《云南恒盛公商号经营史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

② 教育部档案：《函复对于核准孟买华侨小学立案同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全宗号第五卷，案卷13306。

③ Zhang Xing, *Preserving Identity*, pp.14-15, 29, 69-70.

生情况以及教学语言做出考察补正。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华侨教育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受到日军侵略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冲击，或毁于战火，被迫关闭，或被迫接受日军奴化教育和日语教学。<sup>①</sup>相比之下，噶伦堡和印度其他华侨学校难得地成为教育的伊甸园，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华侨教育重镇。

由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诸多要素之影响，即便同在印度，噶伦堡中华学校在教学情况上与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华校呈现出诸多不同。并且噶伦堡中华学校二十年历史进程也经历了重重变化。噶伦堡华人群体较为深入地参与到当地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度有当地尼泊尔、孟加拉族学生入学中华学校。华人学生也具备多种语言能力。多民族混居的情况和边境贸易也使得藏语成为重要交流语言，不仅学校开设藏文课程，也有不少学生在课外进行辅导。相较之下印度其他地区华校早期以方言教学为主，后改为国语。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几任校长都来自委派，曾分别在各地华校辗转任职，是我国侨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代表。普通教师的来源则更为多样，或在其他华校积攒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或是当地华侨子弟，或是前来避难的知识分子，共同推动了噶伦堡中华学校的国语教学发展。

<sup>①</sup> 关于抗战时期印尼华校受到的冲击，参见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